



萧乾 著

萧乾全集

称萧乾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位奇才，是不会错的。巴金就说过，他的朋友中最有才华者是沈从文、曹禺和萧乾。这位奇才的实现带有传奇性，是大悲欢的成功，既有风流倜傥，又有沉重的悲剧。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第一卷
小说卷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萧乾全集

第一卷

小说卷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乾全集. 第一卷, 小说卷/萧乾著.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10

ISBN 7—216—04434—7

I. 萧… II. 萧… III. ①萧乾(1910 ~ 1999)—全集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5055 号

萧乾全集

萧 乾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2.875

字数: 4 068 千字

插页: 50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800

定价: 420.00 元(共七卷)

书号: ISBN 7—216—04434—7/I · 393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萧乾全集

编委会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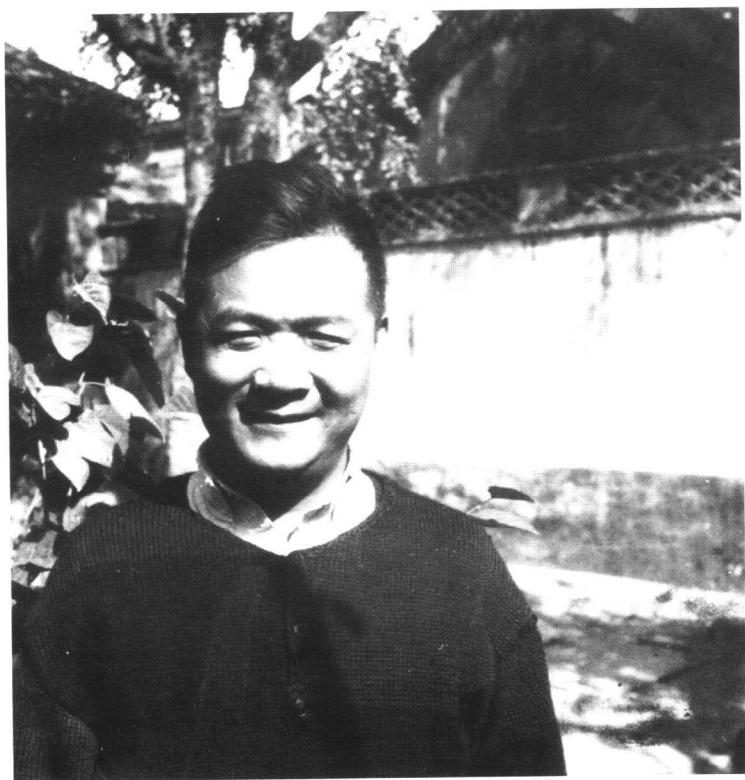
主编：文洁若 傅光明 黄友文

顾问(按姓氏笔画)：

孔范今	竹林	成幼殊
苏叔阳	张昌华	张中和
陆建德	陈漱渝	杨际岚
祝友三	高莽	顾娟
翁如璧	黄伟经	靳飞

编委：

丁亚平	王冬	王辛
叶廷芳	冯建明	李辉
吴天天	肖凤	张斌
张福生	施亮	姚以恩
徐伟	黄豆米	萧桐
谭宗远	戴彤	



1954年3月，萧乾自拍于北京东总部胡同作协宿舍。



1979 年在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国周末”会上发言。



1992年12月2日,萧乾与文洁若拜访冰心,右一是冰心的女儿吴青(柳琴摄)。



1996年9月20日,萧乾在“全国文史研究馆成果展览”开幕式上致开幕辞。



1983年1月,萧乾与李炯才(中)、艾青(左)合影。



1985年4月与巴金在北京饭店交谈(陈复礼摄)。

出版说明

本全集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萧乾先生中文著作结集。主要收入萧乾用中文创作的小说、特写、杂文、回忆录、文论、书信等作品。萧乾先生很大一部分英文著作本集没有列为收录对象；他为中国读者所作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即他的翻译作品，因另行结集本全集也没有收入。

全集的整理工作，主要由萧乾夫人文洁若女士承担，傅光明、黄友文先生也参与并做了大量工作。

全集各卷所收入的许多作品，都出版过单行本或专集，本次整理，除收入这些成集之外，还补充了一些原来遗漏的篇目和新近发现的文章。对作品的内容，文洁若女士作了一些必要的订正和说明。对作品的文字也进行了校勘，全部排为简体。有关地名、人名，因作品写作的年代不同而原来译法不尽相同，为保持作品原貌，本全集未强求统一。为说明各卷具体的内容和整理情况，在各卷之首，均写有“本卷说明”，而原作品在写成或结集时萧乾先生“自序”，仍予保留。

尽管整理者竭尽全力力求整理，但由于萧乾先生笔耕七十余年，作品写于不同的国家，成于不同的年代，历经战乱，原作佚失严重。仅以书信为例，据知萧乾一生，经常书信不断，而此次整理费尽周折，1978年之前所写仅收集到几十封而已，现在全集所收，绝

大多数都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的信件。流失严重,于此可见一斑。“全集难全”,真是令人叹惋。当然,由于我们水平和经验所限,本全集中还留下了其他一些疏漏错误和编校问题,这些,还望广大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8 月

前 言

杨 义

称萧乾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位奇才，是不会错的。巴金就说过，他的朋友中最有才华者是沈从文、曹禺和萧乾。这位奇才的实现带有传奇性，是大悲欢的成功，既有风流倜傥，又有沉重的悲剧。这也许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他反省自己漫长的人生，自我定位为“不带地图的旅人”。还在一九三〇年一个冬去春来的日子，在圆明园废墟旁，曾有两个青年人正在激烈地争辩着“地图”与“旅行”的问题。那个男青年大声嚷道“地图”代替不了“旅行”，他要体验“这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采访人生”。这个宣称“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的男青年就是萧乾。他幼年失怙，寄人篱下，作为北京东直门城根的蒙古族孤儿，自然有一个令人辛酸的孩童和少年时代的故事。但贫困的灰尘掩埋不了天才的萌芽，反而培育了他一股不服命运安排的倔强个性和批判的眼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就开始尝试小说的创作，并很快就在北方文坛升起一颗新星。这给他带来的机遇和命运是，一九三五年燕京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一九三九年到英国，先后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英文系研究生。一九四四年后，以《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身份，亲临欧洲战场。一九四六年回国，仍在《大公报》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

教授。建国后，他历任英文版《人民中国》副主编、《译文》编辑部副主任和《文艺报》副主编。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不定期下放到唐山某国营农场监督劳动。一九六一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一九六九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九八九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这个“不带地图的旅人”走南闯北，跨越东西，大起大落，终成正果，以生命凝结成这煌煌十卷全集。走进他的文本，自然可以窥见一个丰富多彩的传奇世界和不拘一格的文采才华，其间的审视和空白、出格和犹豫，也深有滋味地成为我们探究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风云变幻中的心路历程的一个重要“视窗”。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发展的格局来看，萧乾是京派作家群的后起之秀，曾给这个重人文情怀和审美趣味的流派，注入一股青春的血液。他说过：“一九三五年我接手编《大公报·文艺》后，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每次必到的有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徽因及梁思成、巴金、靳以（但不久他们二人赴沪了，靳以编《文学季刊》，说明当时我们还不忘《文学季刊》的日子）。还有冯至，他应也是京派的中坚。”（《萧乾文集·书信卷》）他参与了以京派核心报刊为依托的组织联络行为，也以创作丰富了这个流派的实绩。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之间，他出版了小说集《篱下集》、《栗子》等，另有长篇小说《梦之谷》出版于一九三八年。

对于历史上是否存在京派，自己是否属于京派，当事人出自对历次政治运动把文学流派过度政治化的顾忌，因而有所保留。萧乾的情形亦复如此。一九三三年，萧乾介入京派文人圈，正是京派发展从前期向后期转折的时候。他的创作带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多描写城乡结合部的下层民生形态，自与其他典型的京派作家有所出入，但沈从文在为《篱下集》作序说：“他的每篇文章，第一个

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这意见我相信将与所有本书的读者相同的。至于他的为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萧乾虽然不曾有过乡村生活的经验,但过早地尝到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的炎凉,凭着对都市生活的厌恶感,很自然地把京派文人的文化观和审美观画入自己“不带地图”的文学旅程。他称:“《篱下》企图以乡人衬托都会生活。虽然你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都寄在乡野。”(《给自己的信》)在这个小说集里,如《小蒋》、《邓山东》、《篱下》等小说的一些主要人物显然为乡野的生命形态所赋予,因而与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彰显“美在生命”和探求乡村文化价值的审美理念颇多呼应。

萧乾小说叙事方式,也能在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方式时体现京派的“纯正的文学趣味”。如同京派文人喜欢创造浓郁抒情风味的小说一样,萧乾是现代小说界具有非常敏慧的诗人素质的一人。他对自然生物、乡土风情和艺术意象饶有意味的感觉,都使他的一些小说具有诗情小说的特征和意境。《俘虏》是一篇黄昏里巷的诗章。一班少男少女为孟兰节的提灯游行准备仪仗,铁柱儿拿着《七侠五义》英雄好汉的派头,荔子姑娘守着情窦初开的矜持,终因一只爱猫的捉拿和归还,不打不成交,一道以笑影和彩灯装点着的里巷的暮色。故事本身就是交织着古老和新鲜、风俗和人情的诗,更何况它有诗一般的环境描写。诗的神韵之所以浸润着萧乾的一些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力于他对语言的敏锐感觉和驱遣才能,得力于他那潇洒俊逸、幽丽委婉的语言风格。

然而,萧乾的文学史角色既属于京派,又超越了京派。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从《栗子》集开始,他就开始超越了京派原有的一些艺术法则,使后期京派发生了“变奏”。他在《栗子》集的代跋《忧郁者的自白》中写道:“我开始仰起头来。对人生,我有了更浓的热望。在工作上,我增大了野心。这趋势,在《篱下集》里还不大看出,因

为我是在濡着一管想战斗而又柔嫩害羞的笔。在《栗子》里，我是学习往大圈子里跳了。我忽略了琐细曲折，（也许我也走开了美的河流！）……投进广大的人生里了。”这本小说集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皈依》、《昙》、《鹏程》、《参商》所表现出来的反基督教意识，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个人精神感受中的民族意识在文化问题上的反映。他的长篇小说《梦之谷》，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分量和魅力的自传性爱情悲剧的诗情小说之一。这类混合着自身的泪水和愤火的题材，若无足够的语言功力，当有情感的烈焰焚毁诗的用心之虞。但作家以出色的语言直觉，穿行于独特的意象和丰富的联想之间，以意识的滑动调节着情感的进发和回流，在字里行间形成朦胧婉曲、掩映多姿的和声与暗示。其语言功夫和成就，较之十年前师法《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茵梦湖》的自传性爱情悲剧之作，明显是高出一筹。可以这么说，萧乾的文学第一步，以真诚走入京派。而在其第二步、第三步，又以同样的真诚走出了京派。这充分表明了萧乾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艺术探索精神和创新才华的作家之列。

这种超越京派的文化精神，在萧乾的记者生涯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出色。或者说他的记者生涯推动他超越了京派。他任职于《大公报》报社，不仅称心地干起编辑文艺副刊的工作，更重要是借助报社的工作性质，有机会接触更广大的人生，实现当初立志闯荡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带地图的旅人”。他在通讯特写这一点上的开拓之功高于小说，此为以往的新文学史所忽略。萧乾将撰写这类文章的目标定位在“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人生采访·前记》）较之小说，他这类文章的现实性更强，极富有战斗性色彩，也写得更加得心应手。这类文章兼及国内国外，国内通讯如《流民图》真实地再现一九三五年鲁西、苏北大水灾中难民的悲惨情景，其犀利的笔锋伸入了所谓“水政分歧”背后的黑幕，揭示了导致灾民挣扎在饥饿、寒冷、乃至死亡线上的根本原因

是比“天灾”更甚的“人祸”。萧乾从汕头的报上看到两份截然对立的《告各界书》，一边是以保长为首的，告发林炎发是一位劫盗；另一边是青抗会呼吁“林同志应重获救国之自由”。由此引发作者去深入调查，写出《林炎发入狱》，揭露了岭东的抗日弊政，终于导致林炎发的无罪释放，显示了这篇文章干预现实的实际效果。《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借用田汉《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来命意，展示了抗战期间百千万民工为了修筑西南通向国外的惟一公路而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表现出中国百姓那种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记者事业，脱颖于国内，大成于国外，赋予萧乾的生命最富丽的色彩。一九三九年秋，萧乾到达英国的伦敦，以驻英记者的身份密切关注欧洲战事的进展，随时将自己的所观所感，通过特写的方式，传递给国内读者，成为中国百姓观察欧洲战事的一个重要窗口。《血红的九月》讲述一九四〇年九月纳粹空军大轰炸伦敦后的悲惨情景，一个好端端的世界都市被炸得稀巴烂。《矛盾交响曲》却为人们展现战时英国勇敢和坚强的民族精神，如一座平民住宅眼看要倒下来，十个壮汉硬是用胳膊托起三层楼，让救护队在瓦砾中抱扶老幼；外面的炸弹声不断，可是艺术馆内的人们却口嚼面包，一面欣赏着音乐家为他们演奏的悠扬乐曲，以一份悠闲透出几份民族的自信。《银风筝下的伦敦》描述为了防止纳粹飞机，伦敦人在天空中放飞了好多银色的气球，成为伦敦天空一个绮丽的景观：“我管叫银风筝，因为它们不但有风筝的庄严，飘逸，而且在秋风中也一样弹出铮铮响声。逢运气，黄昏时也许在什么空场上，看到一个徐徐下降。”这就造成德机永不敢低飞，因而也就永无从瞄准。《活宝们在受难——空袭下的英国家畜》居然让空袭下的英国家畜也上“特写”，展示了一种妙趣独具的观察视角。狗与战争有什么关系吗？文中言之凿凿，要让“这些四足英雄窥窥一个民族的特性”！因而，就有了人为了猫狗犯了灯火管制而受罚；有的人提出家畜究竟是否可以带入防空壕的疑难问题？更有个新郎为了营

救一只落水的狗而奋不顾身地跳入海里，并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还有爱家畜者有时还发挥意想不到的功能，如发起爱狗者的飞机捐款，不一刻即集足五千镑……总之，透过“家畜”的描述，反映英国人生百态和民族性格，达到了尝鼎一脔、借斑窥豹的艺术效果。这些看似“战争闲笔”，却在“难得悠闲”中显示了舒展从容的大家风度。一九四四年随着盟军的西欧战场的开辟，萧乾作为一名战地记者，跟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特写《进军莱茵》，讲述他这段随军挺进莱茵的神奇经历。一九四五年三月，萧乾到美国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据此写成《美国印象》，这是中国较早反映美国战后情况的新闻特写。同年七月，他风尘仆仆赶到纽伦堡，采访对纳粹战犯的审判。通过此次的行程，萧乾踏访了德国南部的一些地方，如慕尼黑的古遗迹、达豪集中营、巴伐利亚的美法占领区，撰写出长篇特写《南德的暮秋》。受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斯诺的启示，萧乾的战地特写往往能够在战火硝烟中敏慧地看取民族深层的生命跃动，因而这类文字被史学家誉为“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旅欧七年，萧乾一方面直接沐浴欧风美雨，受到欧美自由民主的文化传统的熏陶；另一方面受聘于《大公报》，宣传中国文化和抗战，并以异国的眼光观察二战下欧洲人（尤其英国人）的社会状况、民众心态和民族特性。除了特写外，萧乾还做了不少的英文演讲和政论性文章。每期文章，都有一个潜在话题或隐性的对象——中国，即战时的中国如何赢得胜利，战后的中国如何重建家园。他“不带地图”的地图之根，还是在中国。从一九四六年踏上故土始，直至一九四八年，萧乾言说最多最集中的话题是民族国家的建制思考。长期以来一直困扰萧乾的“乌托邦”构想，由此有了较为清晰的表述和体现。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萧乾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好像天生就是个自由主义者。”（《释地图》）然而改革开放初期，他劫后余生，

心里存有疑虑，对自己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形成的“乌托邦”构想还是讳莫如深，竭力避开。一九九一年，萧乾赠送台湾版的《人生采访》给笔者时，曾于扉页中写了一则短信倾吐内心的感慨：“近年，海外一些评论家曾抨击我在重编旧作时，曾大删大砍，而且把三十年代（此处疑应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笔者注）写的文字，有时改得如白开水。他们没经过思想改造，更不了解五七年的滋味，所以我读了有隔靴搔痒之感。然而有时又觉得他们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砍伐得最厉害的，正是这本《人生采访》——一九八四年，我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四本选集时，其中第二卷很大一部分就是选自此书。倘若你把《人生采访》同这本第二卷作个比较，你会发现我砍得有多么狠。例如《瑞士之行》的中心思想是谈瑞士这个由三个完全不同民族、说着各自的语言的国家，何以能百余年来相安无事；在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做到如此富裕。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有真正的民主。而一九五七年我就正是在‘民主’问题上栽的跟头，一九八四年怎敢再重蹈覆辙？于是，我把这部分全抽掉了，《瑞士之行》就成了一篇没有灵魂的纯游记。”萧乾这段心路历程的剖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我”对八十年代，以及半个世纪前的“我”的反思，这在历尽艰辛、命运多舛的中国现代作家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目睹战争对文明的毁灭，对人性的摧残，萧乾站在二战的废墟上思索着中国的出路何在，这成了这一时期的特写、政论和杂文随笔的中心议题。他感觉到，“如果不是把‘民族’放在前面，作通盘的打算，文明也许正是噩梦”。让萧乾吃惊的是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他是一位“把大不列颠从溃败的边缘挽登衽席，摧灭了纳粹，赢得了欧洲战争的胜利，丰功伟绩，足与英国历史上任何杰出的首揆相比并”的人，然而事实是，丘吉尔最后在大选中落败。这说明了“一个民主国家，一方崇拜英雄，一方还要看他所代表的政策是否即是人民需要的政策，这一点非等到人民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智，